



儒家思想及其 现代化

李晓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儒家思想及其 现代化

李晓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思想及其现代化 / 李晓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203-3616-1

I. ①儒… II. ①李… III. ①儒家—哲学思想—关系—现代化—
研究—中国 IV. ①B222.05②D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583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五月在西北也已经是一簇簇美丽的散发着清香的迎春花，黄色的，红色的，非常美丽动人。在这个春意渐浓的季节里，便不由自主地使人想到万物的生生不息，这自然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含义。然而儒家思想要想完成其现代化，就既要有其核心精神的传承，又要有面向当下的改弦更张。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很长，孔子的思想是面对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提出的，而孟子的思想又与孔子的思想不同，他主要是面对战国时的乱局发言。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的血缘家族特点，中国人一直是生活在一个熟人熟事的世界之中的；故而，在古代中国，逻辑性的思想并不受重视，而道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核心。但是在当今中国，一个不同于血缘宗法制的现代社会已经显现并成熟起来，这样的社会形态相对于过去由熟人熟事构成的社会便带上了一定的陌生人社会的特点。血缘家族性社会对于陌生人是提防的，警惕的，而这样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现代社会中，血缘家族性的特征正在弱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要思考儒家传统思想对于这一变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在当今中国，虽然传统文化得到一定的重视，但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传承却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显然，要使中国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在当代中国传承下去，一方面要依赖传统文化本身生生不息的生命之力；而另一方面也要使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能够推陈出新，做

出适合当代社会的调整，正如汤之《盘铭》所说：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①

本书第七章“中国人的心性修养”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李翱著作校释及其复性思想研究”（14BZX054）阶段性成果。本书出版受兰州大学“双一流”建设资金人文社科类图书出版经费资助，在研究过程中亦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与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哲学特质及其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7LZUJBWTD007）资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李晓春

2018年5月于兰州大学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华书局，2012年，第5页。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精神	(1)
第二章 中国人的法象思维	(21)
第三章 中国古代时空观与道观念的演变	(41)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本体论	(57)
第五章 格物致知	(71)
第六章 中国古代思想表述“道”的语言	(78)
第七章 中国人的心性修养	(87)
第八章 熟人熟事的世界和陌生人的世界	(100)
第九章 自然语言与哲学语言	(117)
第十章 儒家思想向陌生化世界的敞开	(132)
第十一章 儒家思想在陌生人世界中的道德践履	(154)
附录一 王弼“体用论”述真	(168)
附录二 试论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继承与扬弃	(183)
主要参考文献	(193)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精神

一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许多不同种类的生物，但是人和其他的生物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仔细想一想，许多人会做的事，其他生物都不会；但是孟子说，人和动物的差距非常小。孟子说的是人有善的良知，而动物没有。但是我想到一种情况，也很有意思，那就是人可以想象出神，而动物却不能。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人的位置处在动物与神之间，人之所以能想象出神这样完善的存在，正是因为人是具有神性的。人具有神性，不过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神，但是正是这一点神性，使人成为所有生物种类之中唯一可以追求精神生活的物种。

追求精神生活的物种与不能追求精神生活的物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动物崇尚武力，动物的精神中并没有善，它们生活在一个以力量为尊的世界中。人在越野蛮的时代也越崇尚武力，权力也常常完全依赖强大的武力来维系；但是武力能征服人的肉体，却永远不能征服人的精神。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各种带有时空性质的景象，星空、山脉、河床、花朵、动物，我们就生活在由这些事物组成的世界之中。但是，也许我们没有深思过，对于人类来说，还有一个世界也向我们展现了出来，这是一个精神的世界。中国人喜欢把我们思考问题的所在称为心灵，因为古代的中国人认为我们想问题的地方是心，而这个心是有灵性的。人的心灵

和动物的大脑不同，人的心灵是可以独立地产生出一个精神的世界的，而这个精神的世界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文化或者文明。我们常常把未开化的人称为野蛮人，野蛮人的精神世界比较狭小，这是与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关的。随着人类物质生产条件的改善，人类世界就会发生文明的提升。

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叫作“轴心时代”的理论，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发生存在一个轴心期，这是在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 600 年至前 300 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 30 度上下，就是北纬 25 度至 35 度区间。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和老子。

这样说起来，人类其实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具有时空属性的具象物的世界，一个是由人的内心构造出的心灵的世界。当然，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是由心灵的世界和具象物的世界共同构成的，我们有时候甚至很难区分它们之间的界限；因为由人类心灵产生的意义世界已经把具象物的世界整合到了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包含具象物的完整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两分的世界。这也说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组织都有两个层次的内涵，一个是遵守物的世界规律的层面，一个是人类文明创生的层面。不过，我们要意识到的是，文明的创生是人类自身的意义建构，不同的文化体会会有不同的建构方式。世界给予我们一个由具象物构成的物的世界，而这个具象物的世界有着充分的空间留给人来创生自身的意义。举一个例子，我们走到一条河流面前，不同的生物会有不同的生活态度，鱼以这条河为家，蜻蜓轻快地飞翔在宽阔的水面上，熊会笨拙地浮游而过，而人类除了游泳，也会造船渡河。河是现实的，是一种物的存在形式，而过河的方式却有不同种类，这些不同种类的过河方

式就可以用来象征人类的不同文明。

人类文明存在着多种文明形式，中国文明就是其中之一。当前，西方文明的浪潮席卷全球，我们在研究中国文明时会不自觉地与西方文明做一个比较，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对西方文明的路径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也可以凸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人类又经过了几万年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暴力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人类从小的氏族发展到部落，再从部落发展到大的部落联盟以致最后进入国家的组织形式，暴力和征服一直扮演着人类社会组织的主角。有了人的群体，就会有群体内个体之间的关系，也会有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一个资源总是有限的世界里，争抢资源的控制权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发现，随着人类各文化体的文明提升，暴力的使用便愈来愈明显地受到限制。很明显，在现代的大工业化生产模式下，一个健康的社会的活力并不是由暴力来激发的，而是由一个个享有充分的平等权利的公民的热情来激发的；而这样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形态正是通过漫长的历史的累积发展和文明提升来达成的。

每一种政治形态对于人类的文明精神都有一个支持的限度，中国古代的政治形态亦复如此，它所能支持的最完美的文明精神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精神，这是一种具有贵族气质的精神，但它却是从贫民到上层阶级都可以坚守的原则。士大夫精神，这一中国儒家传统的形成是曲折的，也是生动的，它塑造了不同于欧洲文明的精神传统。但是，中国古代的文明形态在进入其成熟期之后，却遭遇到了早熟症的困扰，尤其是在面对现代生活时，它的应对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我们想要思考的是，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形态完结之后，面向熟人熟事世界的儒家思想在面对一个陌生化的世界时还能行走多远。我们就像一队从远古走来的旅人，在沙漠的黄昏里，我们感受到饥饿与寒冷，举目远眺，我们的目光企图穿越时空的间隔，努力用精神感应我们明天的出路。

在人类刚刚萌生文明的时期，由于人类力量的相对弱小，凸显

了自然的巨大力量，我们自然不能无限地扩大地理环境对人类政治的作用，但也不能无视其对早期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西方与中国的地理环境迥异，这种差别导致中国人与西方人处在完全不同的生活样态当中。

西方文明的摇篮是古希腊，古希腊之所以会形成以逻各斯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传统是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从地域范围上来说，古希腊本土的整个面积并不大，而且即使这不大的地域又被海洋划分成了大大小小的系列岛屿，岛屿和陆地上山峦重叠，将陆地划分为一些小的区域。显然，在人类生活的早期，不大的岛屿上生活的人口自然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再加上海洋和山峦的阻隔，这就限制了各岛屿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可能性。即使在希腊在小亚细亚和黑海周围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后，其城邦的政治结构依旧没有质的改变。而在现实中，正如我们所分析的，希腊形成了一系列的城邦；城邦都不大，人口有限。古希腊虽然也存在许多相互征服的战争，但征服的困难性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荷马史诗》中看到。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中，据说为了争夺世上最美的女人海伦，以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为首的希腊军队进攻以帕里斯和赫克托尔为首的特洛伊城，战争进行了十年之久，最后希腊人通过使用计谋（特洛伊木马）才得以攻下特洛伊城。特洛伊战争显示了这种旷日持久的远隔海洋的战争的困难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希腊虽然有斯巴达这样的专制政体，但也存在着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体制。总的来说，希腊各城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则，虽然也存在着雅典对其他同盟城邦的控制和压榨。这样，希腊各城邦之间由于海洋的阻隔，形成了一种相对平等的对话机制。本来希腊可以一直遵守这一原则，但是在古希腊发展的后期，由于雅典的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斯巴达终于与雅典开始了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结果促成了希腊的最终衰落。

在世界的各个地域，专制集权统治非常普遍，而在希腊虽然有专制集权的斯巴达，但也存在着民主的雅典，这个意义就很独特。

这就使得希腊文明的这种政治现实不同于只存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因此导致了城邦内部和外部对规则的强调，而这种城邦内部和城邦之间强调规则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基因产生了强调求知和规则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使得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奠基于以逻辑推演为基础的形而上学之上。

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而欧洲的地理境遇与希腊有一定的相似性。欧洲大陆向东与中东接壤，向南与北非相望，这三个地区环地中海而形成三个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都与大的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欧洲的莱茵河、易北河、奥得河、多瑙河等水系，北非的尼罗河水系与中东的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系足以支撑起鼎足而立的三种文明形态。显然，在西亚、欧洲和北非之间存在着一种力量的平衡，这导致这一地区存在着专制集权和民主分权两种形式之间的张力。西方文明的这一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相比于从未出现过民主制的文明，它无疑多了更多选择的余地。

罗马人的情形和希腊人相似，他们来源于同一种族，同属于印欧语系。而且希腊对罗马有着很大的影响，希腊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一些殖民地，并将字母表、艺术、神话、宗教传播到罗马。最典型的是罗马神话，它本身就取自希腊神话。公元前509年，罗马摆脱伊特鲁利亚人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这一统治秩序有别于中央集权式的统治，王权被排除出了共和国。而罗马存在的地域又与希腊不同，因为意大利半岛的亚平宁山脉是南北走向的，它并没有把意大利半岛隔成一块一块的独立的区域，而罗马时期著名的阿庇乌大道就从罗马一直通到布朗迪西恩。这使得罗马有机会统一整个意大利，并发起了征服欧洲战争，最终建立起罗马帝国。与希腊的情形一样，罗马的政治格局也显示了民主与专制集权之间的张力。罗马早期废除了君主政体，权力归于两名执政官和元老院，而两名执政官则由选举产生，他们来源于贵族，任期一年。罗马进入帝国之后，虽然权力日渐集中，但后来有许多执政者把权

力传给他们的养子，这与完全的专制集权又有些不同。然而，也许是欧洲幸运，罗马最终并没有在欧洲奠定专制集权独大的局面，因为罗马晚期遭到了来自周围蛮族的入侵而使得其集权统治最终彻底崩溃。

欧洲的入侵蛮族以日耳曼人为主，日耳曼人的权力来自自由民大会，王和军事首领由选举产生，而欧洲的封建制正是产生于日耳曼人的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基础之上。这种新的文明在欧洲建立起的封建制与中国的封建制表面上很相像，但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欧洲的封建制不是以血缘家族的大宗小宗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而是以地域性的契约关系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欧洲封建制度是国王与大小封建主以契约规则建立起来的，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一定的透明性。

历史的发展是线性发展和非线性发展的统一体，西方文明除了上述线性发展的原因外，还存在着非线性的因素对其发展的直接影响。西方文明的摇篮是古希腊，古希腊是由一系列的岛屿构成的，我们在这里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希腊会成为欧洲文明的摇篮？其中一个原因是分立的岛屿和海洋的阻隔，而另一个原因是，它也许是一个微型的欧洲。这个微型的欧洲并不是说它的形状，而是说它的结构。而在一个微型的世界中能发生的事不一定会在一个大型的世界中发生，也就是说，在希腊世界中出现的西方文化的传统对于欧洲来说是一种幸运。当希腊文明中已经诞生了形而上学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后，希腊的精神随着罗马帝国的征服而被放大到了整个的欧洲。欧洲的格局在骨子里是和希腊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即使是希腊的传统也可能被放弃。这让我们想起中国先秦时期的名家和后期墨家对逻辑的讨论，由于它不与中国文明的精神相契合，故而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处在了被遗忘的状态。欧洲大陆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大陆，它向亚洲和非洲完全地开放，这是一个面积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这样大范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已经展示了它的不可限量的前景。如果没有古希腊

发展起来的文明，欧洲有可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巨人。但是欧洲很幸运，它有古希腊这颗珍珠，它将在古希腊发展起来的文明放大到了整个欧洲，又从两河流域学习了西伯莱的信仰精神，从而塑造出了欧洲文明的精神版图。和古希腊一样，欧洲在面对亚洲和非洲时，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欧洲的莱茵河、易北河、奥得河、多瑙河等水系与中东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北非的尼罗河流域环绕地中海，构成三个鼎足而立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政治和经济在不同文化体之间的竞争和交流构成了这一地区不同文化体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二

与欧洲的历史进程相比，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国东面和南面是辽阔的海洋，中国人也曾在海洋上占据很大的优势，中国远在欧洲人之前就到达了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地，但是中国人在海洋上活动的成效的确比不上欧洲。直到现在，学者们还不明白为什么明代要派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进行七次远航，而且最终为什么这一系列的远洋活动突然就终止了，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明确的原因。这样说起来，中国内陆的特点更明确一点，中国的北面是严寒的西伯利亚，西部是面积广大的草原和干旱沙漠地区，这一地区虽不能隔断中国与中亚、欧洲的联系，但它总是时断时续。中国的西南部是海拔很高的青藏高原地区，严酷的环境使得这一地域人口稀少，并从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交通。

在人类早期，无论是游牧还是农业，都与河流的走向和流域有着重大的关联。中国文明是一种封闭的内陆文明，它的中心在于黄河流域，黄河流过中原，在这里形成了大面积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成为中国文明的政治、文化与军事中心。中国早期文明逐鹿中原，谁获得了黄河的控制权，谁就获得了中国的统治权，而这唯一的无

可匹敌的黄河也深深影响了中国集权社会结构的形成。治理黄河在古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早期各部落之间的政治结构的形成就与共同治理黄河有关。传说，禹的父亲鲧就因为治理黄河的失败而在羽山被杀，而禹则吸取了鲧治理黄河的教训，不用堵的方式，而用疏通的方式才取得了治理黄河的胜利，并因此而被后世尊为圣人。

疏通河流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与古希腊面对海洋的感觉完全不同。海洋是古人类面对的一个无法更改的现实，它不像河流那样还存在人可以改造的可能性。所以，海洋的意义就是存在的意义，是人类所要面对的规则；而河流则不同，当古中国人在治理黄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人的力量似乎可以凌驾在自然的力量之上，而人类在古代面对海洋时的感觉则恰恰相反。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逐渐形成了宗法血缘氏族集权体制，这个集权体制在周代开始体现为宗法血缘氏族的封建制，在秦以后体现为宗法血缘家族的郡县制。周代之前的夏代文献很少，殷代开始有了文字记载，大约夏和殷是封建制的萌芽时期，但却不是封建制，夏的体制是父亡子继，殷的体制也没有大宗小宗，而大多是兄弟相继。夏和商与诸侯的关系大约类似，商的控制力更大一些吧。夏和商大约都没有能力完全性地征服诸侯国，故而诸侯国有着很大的独立性，只是尊夏与商为王，像是一个联盟。中国的集权体制在早期是依赖于宗法血缘家族的统治的，而这种血缘关系在西方很早就弱化了。比如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在雅典掌权后取消了原来的部落，建立了十个按地域划分而不是按氏族血缘划分的新部落。再比如，罗马帝国给予意大利半岛四分之一的人公民权，其余的人则享有拉丁公民权。但是在中国，这种血缘宗法制一直维系了下来，只是到清末才逐渐弱化，而这种血缘家族的完整性有赖于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政治统治方式。

中国的征服与统治方式一开始就与西方不同，中国人活动的地

域相对狭小，各部落相对稳定，所以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把被征服的民族抢掠回去做奴隶，而是把被征服民族整体地作为封国或属国来统治，这样就保留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双方的血缘关系，并逐渐形成了“兴灭国，继绝世”的统治思想。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就是说，当一个部族的政治力量征服另一个部族的政治力量后，它并不会彻底毁灭这个部族或这个部族建立的王国，而是保留这个部族的完整性，并使其宗法关系或者说血缘关系保持不变。比如，当周战胜商后，它取得了天下的统治权，但它并没有彻底覆灭商，而是把战败的商的部族封在宋，使其继承了商的血缘宗法传承。这是中华文明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这一思想似乎在说，所有的部族都有着存在的合法性，没有人有权力覆灭它，而各部族所争的只是天下的统治权和天下文明的正统地位。当然，这是总的趋势，其实周灭商后，只是留下了监国，商的势力并没有完全被控制住，而当周公在管叔、蔡叔鼓动殷的遗民叛乱后，用兵三年，才真正征服了商。从此，周开始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原来商的势力范围，商的部族也分配给这些新封的诸侯国。所以周公之后，中国的国势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来松散的王与诸侯国的关系正式开始有了紧密的关系，即封建的关系；而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也和以前的实际意义不同了。

也许正是这种社会形态的质的转变，才使得周开始意识到德的重要性。显然，在夏和商，血缘氏族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其他的部族击败你，也不会实质性地真正控制你，弱的部族只是称臣，交一些贡物，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并会听从胜者的号令去做一些事情，比如征战。但是当周实质性地把其他的部族纳入其直接的统治，这就意味着，其他被征服的氏族在血缘上对周的不认同，这导致周必须要用德来统治其他的血缘氏族，而不能靠自己这一系的血缘宗法了。

显然，中国的集权统治一开始就直接建立在这种牢固的血缘关系之上，在夏代和商代，这种统治是血腥的，以后温情脉脉的儒家

的伦理关系在这个时代还很少看到。从《尚书·甘誓》中我们看到，夏对于“五行”和“三正”有了一定的重视，而在《尚书·汤誓》里，我们则已经看到了对德的一定的重视。《甘誓》是夏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五行”指的是水、金、火、木、土五星，也就是指星象，而“三正”则指的是最重要的几个大臣。夏为什么要征伐有扈氏，夏给出的理由是有扈氏不重视天上星象显示的意义，也对自己朝中的重要大臣没有尊重。显然，夏虽然依旧很崇尚天象，但已经开始对大臣的意见比较重视。这虽然还不能称为是德，但已经有了德的苗头。而《汤誓》则是商汤征伐夏桀的誓师词，在这篇誓师词中，商汤给出的征伐夏桀的理由是夏桀搜刮夏的财富，耗尽国家的力量，以至于夏的民众都在诅咒夏桀说：“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完蛋，我愿意和你同归于尽。”誓词还说道，夏桀的德性如此败坏，我一定要去征伐他。但是，这时候的“德”是有特定的含义的，至少可以说德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取得压倒一切的话语权；所以，在商取得政权后，商的末代皇帝商纣王还是认为，自己的地位是上天所给予，没有人可以夺去。

然而，由于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推翻商的周人已经意识到了天命的无常。显然，由于社会的发展，被征服部族与征服者的关系更加紧密，以至于德开始超越天命并开始改造天命的意义。德超越天命并开始改造天命虽是从周开始的，但这一历程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量的累积。只是到了周代，这一转变才明晰化了，中国政治文化也走上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德性澄明的道路。

周施行了大宗小宗的封建制，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在这个大宗小宗的体制中，德的地位在逐渐加强，成为调节封建制社会关系的枢纽，而中国后来具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种子似乎已经开始生根发芽。与商实行的兄终弟继的承继关系不同，周实行的是大宗小宗的血缘宗法关系。这就是说，王有几个儿子，其中的嫡长子将继承王位，嫡长子这一系就是王室的大宗，而其他的儿子也有机会得到封地成为诸侯，这些儿子就是周王室的小宗。很显然，实

行大宗小宗制度的封建制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大宗的地位是受到各系小宗的拥护和支持的。我们没有发现在封建制下会出现农民起义或农奴起义，这是因为在封建制下，所有的人都处于大宗小宗的政治秩序之中，下层的氏族成员是没有可能成为王的，王的地位是天生的。只有在封建制彻底瓦解后，中国才在秦末出现了第一次农民起义，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想要当王的农民——陈胜。

周的封建制经过几百年的运行，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小宗的力量逐渐加强，而血缘宗亲关系却又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疏远，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的封建制终于走到了终点。秦取代周而统一中国，这次的统一比周的统一更加彻底，秦在全国实行了郡县制，这是一种迥异于封建制的体制。

三

秦统一中国后，在中国推行郡县制，这一步是对的；但是秦的统治思想尊崇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国，偏离了德治的传统，再加上被征服各族并没有在精神上臣服，故而秦竟在十五年后灭国。在灭秦的战争中，有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项羽，一个是刘邦。本来项羽的军事力量更强，但他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力量，而在于见识。项羽以为秦的失败在于没有如周一样实行分封，故而 he 再次进行了分封，但是正是他分封的汉王最终覆灭了他的政权。显然，封建制之所以不能维系，就在于血缘氏族宗法关系的日益松弛，而血缘氏族宗法关系又是封建制得以维系的基础。没有了它，封建制将无法继续生存。汉在这一点上则做得比较顺利，刘邦在楚汉相争时，迫于形势一共封了七个异姓王，但他当时就感到了异姓诸侯王的威胁，所以他后来陆续除去了除长沙王吴芮的其他六个异姓王。后来又分封了一些同姓的王，但汉基本上最后是先灭异姓王，后灭同姓王，从而建立起大一统的官僚政治体系。

与封建制比起来，郡县制是中央政权直接统治整个国家，如果